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霍军亮,吴春梅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基地,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又一根本性举措。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而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存在着组织建构不够优化、经济基础不够优厚、文化基础不够优质、社会基础不够优良等困境,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各级党和政府要不断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构建体系、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积极传承和复兴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有效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 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党组织;困境

中图分类号:G 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3-0001-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3.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在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午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根基在基层,一定要抓好基层党建,在农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1]我们的事业前进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哪里。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正跨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奋斗目标的开创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和完成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终端和末梢,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抓手。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进一步发挥、履行好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过程中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的功能与职责,应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与核心目标。

乡村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土壤与基础,对中国乡村的审视、表达,多视角地分析中国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一个真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前提和关键。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广大乡村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掉队”、“落伍”与“衰落”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若不及时加以校正,不仅将直接关系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也会在根本上影响伟大斗争的进行、伟大工程的建设、伟大事业的推进和伟大梦想的实现。与 20 世纪 30 年代相比,当前中国的乡村衰落危机与改革开放后中

收稿日期:2017-11-30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司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委托项目“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村党员研究”(20171128);湖北省思想库项目“新常态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HBSXK201709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2662017QD030)。

作者简介:霍军亮(1978-),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治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国社会加速转型、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虽然“中国乡村的衰落只是一个相对衰落的问题,但这种衰落,却存在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的趋势。”^[2]而且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大多数乡村仍将面临人口日益减少和衰落这一阵痛过程。这种不良趋势和阵痛过程已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政治结构与权力运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将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结合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时代任务与目标,精准剖析乡村衰落给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就成为当前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新目标与新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特别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3]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坚持了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的一贯战略思想,又深刻回答了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下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一重大命题。实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导向和农业农村短腿短板导向做出的战略性决策部署,是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安排^[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意味着乡村振兴是一个全面的目标,包含着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清晰勾画出了振兴乡村的美好前景和实现路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负有重大的使命和责任。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对农业经济领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农村社会领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对农民生活向往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福音,这也必然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理念、方法和路径等各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与变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望。

其一,以组织力建设为根本遵循,明确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5]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新目标、新定位,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农村基层党组织也要时刻以提升自身的组织力为建设方向和发展目标,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决定、领导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团结动员农村群众、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6]。

其二,以领导力建设为核心原则,坚定和明确党对农村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要进一步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各领域的政治力和引领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会各领域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树立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重大事项、重要问题、重要决策、重要工作等方面的领导权威和最终决定权,坚决防止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会领域缺位、错位、失位和被弱化、虚化、边缘化等现象。

其三,以发展力建设为基本思路,进一步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造血功能和忧患意识,提升自身的建设质量和组织活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引领农村社会发展的能力。要严格落实农村基层党建责任制,重点做好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党员队伍建设、组织生活建设、基础保障建设和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等工作,努力把每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都建设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坚强堡垒。

其四,以覆盖力建设为基本前提,进一步强化党在农村执政的组织基础。在组织体系的构架上,要努力扩大农村党组织的覆盖面和辐射能力,对于符合组建党组织条件的,做到应建尽建,切实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在设置方式上,要不断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深刻变化,探索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确保每一名农村党员都纳入到农村基层党组织,都能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管理^[6]。

其五,以群众力建设为基本路径,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心骨”和“领头羊”的作用。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更要发挥“主心骨”和“领头羊”的功能和作用,做好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时刻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不动摇,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自觉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偏离,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6];严格整治村干部腐败、“村霸”横行、宗族宗教势力干扰农村工作等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不断优化农村社会政治生态。

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困境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带领广大农村群众发展乡村、振兴乡村已成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光荣而又紧迫的历史使命。这种新的历史使命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与要求。但由于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掉队”现象,乡村在某种程度上的衰落不仅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与困境。

1.组织困境——不够优化的组织建构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覆盖力和组织力

组织建构包括组织本身的构建体系和组织内部的成员结构。构建合理分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在农村的全覆盖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在农村领导地位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保证。但在乡村衰落的过程中,随着自然村庄数量的减少和人口密度的下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构架体系和人员构成的不良变化倾向严重制约着覆盖力和组织力的提升,影响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在组织构架体系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数量日益减少。通过整理中共中央组织部从2010年开始公布的历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的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有59.4万个建制村建立了基层党组织,2011年为59.1万个,2012年为58.8万个,2013年为58.4万个,2014年为57.7万个,2015年为57.2万,到2016年已缩减为55.1万个,2016年比2010年整整减少了大约4.3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7]。这说明随着自然村数量的减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分布也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合并调整。由于中国的农村大部分村落比较分散,村落与村落之间相隔较远,这就使得合并后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平均覆盖和辐射的区域变大,这也势必会给合并后的党组织开展活动带来很大不便,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在组织人员构成上,后备队伍缺乏优质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土地收益的减少以及市场经济的刺激和带动,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技能、懂得经营而又头脑相对灵活的中青年农民、农民党员开始逃离土地和农村,纷纷进城务工、经商或另谋出路,留守在家的只有老、弱、病、残弱势群体。另外,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相当多的中青年农民认为入党“政治上没盼头,经济上没甜头”,致使农村党员队伍后继乏人。这些因素导致部分村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工作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当多地方的村干部存在着“三难”现象,即难选、难干、难管,一些地方的村支部、领导班子不调整不行,调整又没有合适人选^[8]。

2.物质困境——不够优厚的经济基础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9],“因而

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0]。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嵌入在农村的执政力量,其建设的成效始终受到特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人、财、物等资源的主导性支配地位,是乡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与支配者,正是由于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绝对权威性和非常有效政治动员能力”,其功能也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11]。改革开放后,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挤压下,资本纷纷投向城镇以便获取更大利益,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农业的衰退和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化,村庄作为经济主体的意义日趋消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通过调研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多数集体经济都转为包含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形式,尤其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可支配的物质财富少而又少,服务群众就往往显得捉襟见肘。这种情况尤其以中西部农村为普遍,农村党组织通过党费返还等形式,一年开展各种活动的经费多的也就在3 000 元至 5 000 元左右。”^[12]农村集体经济的“空壳化”现象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可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手段和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农村集体经济是公有制在农村的重要存在形式和实现途径,此类不良现象不仅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和功能,也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经济基础,侵蚀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权威,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行动力的提升,并日益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的最大制约因素。

3.文化困境——不够优质的文化基础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吸引力

“没有了乡村文化,乡村也就‘形在,但神已散’,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真正的乡村。”^[13]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一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创造活动,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是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发展活力和吸引力的现实基础。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5]。承袭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已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党执政理念的重要源泉。乡村对优秀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是其他任何载体所不能替代的,乡村的存在与发展既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和转型,也孕育和保存着乡村得以存在的历史文化。优秀的乡村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彰显着经久不衰的优秀文化基因,植根在中国广大农村群众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乡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在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优秀乡村文化予以积极关照,并从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拓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资源,激发自身的活力。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乡村社会的持续衰落,一些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被遗忘或遗失。当前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一场裂变,乡土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图式逐渐变更,村落和家族共同体作用逐渐弱化,村民在社会行为中越来越凸显工具性;植根于小农经济、被世代中国人作为精神依托的传统伦理道德维系逐渐消失,传统文化价值被质疑的倾向日益明显,而新的令人信服的文化价值体系又无法快速提供和生成,许多人内心深处处于什么都不信的地步,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信仰迷失、理想缺失。传统乡村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也正日益解体,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日益弱化,“乡约”、“村规”和“宗法、家法”不断消失,社会伦理秩序不断瓦解,“讲秩序、讲正气、讲人情”的传统理念不断遗失^[16]。在此种文化结构和社会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可采用和借鉴的优质传统文化资源越来越少,村党组织的自身活力难以彰显,对广大农村群众的吸引力也难以有效提升。

4.社会困境——不够优良的社会基础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存在目标和运行逻辑根本在于对党的执政理念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但这种逻辑生成和运行过程会受到乡村社会中各种力量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乡村

的萎缩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会演化成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衰落与式微会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人口、资源等各个方面,往往会导致农村基层的公共权威退化、公共服务短缺和公共性的衰落,使得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的构成会不断发生变化,良性的、均衡的社会基础遭到削弱和破坏,会给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形成一定的社会困境。村庄繁盛时期,村级基层组织对村庄事务决策享有最高权威,如今却随着村落的不断发展演变,基层组织公共权威正不断退化,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号召力、影响力逐渐下降,村庄治理表现出一定的失序状态^[17]。村庄的大量减少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乡村过疏化现象的出现,在乡村过疏化村落,村落家庭共同体处于凋零状态,村落的组织系统和邻里支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衰落村庄地域村落公共服务衰败。因其人口密度稀疏,使得乡村不存在足以支撑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所必需的一定密度的人口,直接导致发自政府的公共服务无法下沉,来自市场的服务无法在村落中展开,最终导致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运转都出现断裂^[18],这也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开展缺乏必要的公共空间的支持,失去了生成凝聚力的载体与平台。公共性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永远不可或缺的要素,乡村公共性对于促进农村基层社会各种组织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但乡村衰落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和“原子化”趋势更为明显,农民的个体化意识不断增强,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关注日趋减少,乡村的公共性不断衰落。乡村公共性衰落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村组织和村集体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基本失去意义,随之而来的是霸痞势力和宗族宗教势力的兴起,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往往失去话语权,乡村治理纳入恶势力的股掌之中^[19]。乡村社会出现的这些不良社会性因素,若不加以引导和纠正,必将会进一步削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影响党在农村的凝聚力和社会号召力。

三、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探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准确把握当今农村社会变化的特点和趋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这一核心目标,定向发力,精准破解制约瓶颈,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1.优化组织构建体系,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基础

要以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重,进一步构建“全覆盖”的乡村党组织构架体系和优化乡村党员结构。农村基层政权强大的常规性权力,来自于其与国家任务、乡村社会性质之间的契合性,只有适宜于特定乡村社会性质的农村基层政权才能有效地完成具体的政治目标和国家任务,才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农村社会的有序,从而减轻现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20]。农村基层党组织之所以在农村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力量和执政依托,契合国家政权建设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与需要,也在于村级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区域内有着科学合理的构架体系和优质的党员队伍,能够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全面、高效地贯彻和落实。在组织体系构建层面,中国共产党要重拾民主革命时期乡村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和优良传统,要充分考虑村级党组织构建分布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简单地随着村庄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减低而减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和分布,不要让经济效益和成本核算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设置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当前,虽然自然村庄的数量有所减少或者人口密度有所降低,但农村的地域在一定时期是不变的,在自然村庄衰落的地域往往是权力真空地带,更易滋生宗族、宗教和封建迷信势力,也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力量的存在和治理。新形势下,要“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有利于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6],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设置方式。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要创新设置模式,逐渐变革“一村一支部”的基层党组织架构,打破地域界限和单一的垂直体系,探索党组织设在农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形式;另一方面,也要从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不能单纯追求党组织的人口覆盖密度,在乡村凋零与荒凉地带更要加强党的存在力量、丰富党的存在形式,实现党组织对农村的全覆盖、零遗漏,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在党员队伍结构优化层面,一方面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增强从农村优秀青年群体中培养积极分子、吸收党员的主动性和工作力度,提升党员队伍质量;另一方面要严格党员队伍管理,村党支部要根据农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增强农村党员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责,并按照十九大报告中的新要求稳妥有序地开展不合格党组织处置工作,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和带动作用。

2.发展和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物质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化既有村庄自然变迁的影响,也有城乡发展战略推动的影响,而在当今,城乡发展战略的影响要明显大于村庄自然变迁的影响。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过于追求城镇化的规模与速度而忽视其内容与质量,简单地进行模仿、复制,而乡村则成为落后和传统的象征,在城镇化进程中完全沦为改造和消除的对象。这种对城镇化和乡村的片面理解,会推动各地政府片面提高城镇化率,减少对落后农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必然会导致各种资源高度向城镇集中,进一步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弱化乡村集体经济,从而进一步加剧大面积的乡村凋零与荒凉。针对如何推进城镇化,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没有农村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有些地方错误理解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干了一些‘以城吞乡、逼民上楼’的事,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把农村居民点都变成高楼大厦。”^[21]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5]这些讲话和文件精神进一步指明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为贯彻和实施农村政策提供了根本遵循。第一,各级党和政府要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加紧破除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篱栅”。要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小城镇,以促进人的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乡村社会图景为基本目标,减少大规模的“拆村”现象,引导优秀人才积极“回流”农村,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复兴乡村社会,寻找乡村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避免拉美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衰落现象。破除阻碍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振兴乡村的最根本途径,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加快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步伐,加大培养乡村自组织的能力。第二,大力发展战略经济,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型。要大力发展战略农村乡镇集体企业,鼓励和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输送与转移,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特色农业、旅游农业转型和发展,从根本上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实现民富村强,从而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基础。第三,用好“资本”这把“双刃剑”,防止乡村集体经济的空壳化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边缘化。要警惕资本借助乡土主义、新上山下乡等各种“新乡村主义”对乡村形成实际控制和对乡村集体经济的“二次剥夺”,避免外部资本借助国家发展主义的力量任意改变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态势,减少资本力量对乡村党组织、村委会、乡村集体经济以及其他乡村社会力量的控制和对抗,防止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卷化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边缘化。

3.积极传承和复兴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文化基础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向下延伸,要提高其在农村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借助乡村文化的涵养与支撑,进一步丰富政党文化、拓展政党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乡村是传统的宝库和栖息地,失去乡村也就失去了传统、历史与文化,也就丧失了前进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化、工业化强烈冲击的社会生活中描述到:“一切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2]现代化进程一般会衍生出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富裕与贫困、结构与重建等一系列悖论,稍不注意就容易跌入“现代化”陷阱,致使文化断根,造成社会断裂。而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举措之一就是要重拾传统优秀文化,用

好传统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传统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他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3];并在 2014 年 2 月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23]。乡土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乡村的集中体现,是整个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土壤和源泉,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孕育着丰富的乡土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乡村管理制度等,与当今农村基层党组建设提倡的和谐、有序、共享的理念不谋而合^[24]。要对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适合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需要。农村基层党组建设过程中可以充分吸收传统乡土文化中重实际而轻玄想的务实精神,夯实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文化基础;挖掘好传统乡土文化中重义轻利、勤劳俭朴、戒骄戒躁等价值追求,拓展加强农村党员品德修养和作风建设的文化资源。现代化进程是当今乡土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最大威胁,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防范全球化和快速城镇化导致的文化同质性趋势,尽力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并对其内涵进行科学阐释。同时,各级党组织要增强保护、发展和复兴乡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规划工作,做好乡土文化宣传与教育,自觉认识乡土文化在培育“精神家园”和拓展“执政资源”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不断为农村基层党组建设注入新的文化力量。

4.有效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社会基础

乡村衰落是社会转型期的客观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公共服务短缺和公共性的衰落导致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内的公共权威的退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整合社会的能力有所下降。而治理绩效和对不同阶层利益的整合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良好社会基础的重要抓手和来源,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存在、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建设的过程中,要以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为核心,不断建构和优化良好而稳固的社会基础。一要正确认识传统乡村的社会功能。中国是个乡村大国和农民大国,乡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治理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功能。乡村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和精神价值,可以借助其天然的“熟人”优势,培育具有共同归属感的乡村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有效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互动;乡村社会在礼俗、家风家规、习惯、乡规民约、教化等方面积极精神价值,对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和村民关系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要时刻挖掘好、阐释好、发挥好乡村的这些积极功能和价值,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厘清历史脉络、找准发力方向。二要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加农村群众的获得感。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具体的决策和实践中要切实关注民生问题,做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给农民之所需”,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农民的各种利益,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牢固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三要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处理好“两委”(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实现好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诉求,虚心接受农村社会各类群体对党组织的监督与批评,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四要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转型,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牢牢把握党对农村社会治理的领导权、主动权,综合运用各种方式进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整合,引导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各类主体和力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五要树立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政治生态。村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在思想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培育层面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主动同一切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划清界限并进行批判和清理,坚决遏制地痞村霸势力和封建迷信活动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干扰和破坏,树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良好组织形象,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7-10-20(1).

[2] 王君柏.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34-37.

[3] 习近平.不能忘记农民淡漠农村[EB/OL][2015-07-19].<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19/c70731-27325093.html>.

[4] 韩长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C].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2017.

[6] 李小新.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C]//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010—2016年)[R].北京,2017.

[8] 马建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16(9):12-17.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11] 朱正平.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强化动力与实现模式探索[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1(5):24-29.

[12] 田改伟.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1):108-112.

[13] 朱启臻.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守望美丽乡愁——要看到乡村价值,也要与时俱进[N].人民日报,2015-03-19(3).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1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1).

[16] 霍军亮.乡土文化变迁视阈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对策[J].学习与实践,2016(9):107-115.

[17] 李国珍,张应良.村庄衰落的诱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重庆市G村的调查[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72-79.

[18] 田毅鹏.乡村过疏化背景下村落社会原子化及其对策——以日本为例[J].新视野,2016(11):26-31.

[19] 武中哲,韩清怀.农村社会公共性衰落的显性后果与公共性构建设想[J].党政视野,2016(48):4.

[20] 董磊明.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论村庄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体系[J].人民论坛,2012(9):27-36.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6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31.

[23] 人民日报.习近平谈核心价值观——民族的根与魂[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7-31(5).

[24] 赵进斌.在城镇化的铁铲下留住心中的“乡愁”[N].中国艺术报,2015-04-17(7).

(责任编辑:陈万红)